

第一章 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

家长素质与儿童安康成长

[Abstract] On the long way of child development, the genetic factors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potential for congenital development, while environmental factors promote or interfere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all the time, among them home environment stands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t childhood.

A comparism of family conditions has been studied between a group of healthy and excellent children (group A), 4-6 years of age, and a control group (group B) of general children with same age and sex, in same kidergartens. There were 128 children in each group. By physical examination the average weight, height, blood hemoglobin etc, of group A children were much higher than group B, the mean intelligent quotient (IQ) of group A was also 12 scores more. Analysis of the parents conditions and their mode of nurturing of these two groups indicates following differences, the parents of group A showed characteritics: ① the education level were higher, ② read more books and journals about childcare, ③ gave earlier musical education, ④ paid much attention to nurturing non-intellectual characters of a child, such as, emotion, behavior, interest,

confidence etc, ⑤ often delivered education by encouragement, inspiration, direction, and played the role as a model both in language and action, while in group B more children were over limited or spoiled, and also less coordination between parents. According to the home environment quotient (HEQ) evaluation, group A got 20 scores more than group B, besides, IQ of the children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ir HEQ scores.

在儿童少年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生物遗传因子赋予其先天发展潜力,而环境因素则时时刻刻起到促进或阻挠其发展的作用,环境因素中尤以父母家长为孩子营造的家庭环境最为重要。家长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最深最大,因为:发生作用的时间最早,从小生命开始父母对子女产生影响,特别是母亲,胎儿就在妈妈子宫里逐渐长大,什么都得靠孕母;亲子关系十分亲密,而且几乎每一个父母都热爱自己的孩子,这也可说是一种天性或本能;家长和孩子的接触延续时间最长,即使到了 18 岁成年后,甚至自己有了小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的接触仍可延续数十年;家长照顾孩子最多的时候也正是儿童迅猛生长发育、成熟的阶段,是最需要父母保护抚养、教育的敏感时期,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孩子印象最深、影响最大。

在影响儿童安全健康成长的各种因素中以家庭环境、父母素质最为重要,现举我国的一些例子如下:

——上海市健优儿童与普通儿童相比较(4~6 岁幼儿各 128 名),健优儿童为全市评选出来,有强壮的体质(包括体重、身高、血色素等指标),智力发育优良(平均智商超出对照组 12 分),且具有良好的品性(见表 1)。并按同年龄、同性别、同幼儿园、同班级要求,以 1:1 比例配对抽取一般儿童作为对照组,分析其家庭环境中有哪些因素促进儿童优良发育。

表 1 儿童品性和社会适应能力比较

项 目	健优组 128 名(%)	对照组 128 名(%)	P 值
活泼开朗	82	62	<0.01
聪明好学	63	43	<0.01
好胜	49	26	<0.01
伙伴关系良好	86	66	<0.01
任性	18	32	<0.01
胆小或不合群	4	10	<0.05

分析两组儿童的家庭教养环境,尤以父母素质为重点。父母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理想、情趣、家庭关系、生活方式、对子女抚育方法,也决定其职业、经济状况等家庭生活条件。健优组家长高中以上文化者为对照组的 2 倍。重视学习育儿知识无论文化程度高低如能重视对子女教养,注意科学育儿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才能使孩子真正受益。两组家长阅读育儿书报的比较(见表 2)。健优组家长虽有 1/3 未上过高中,但绝大多数注意教养知识学习,具有较好的育儿知识和能力,为儿童成长提供有力措施。健优组家长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智力开发,在孩子 6 个月内就经常与婴儿讲话,用玩具逗引,经常听优雅动听的音乐(见表 3),充分刺激发挥婴幼儿的视、听、触觉等潜力,促进大脑发育,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开花结果,健优组儿童开始叫爸妈的月龄、独立唱歌、用普通话朗诵诗歌年龄均比一般儿童大大提前。儿童期各种能力发育都有关键期,父母要抓住关键期,不失时机地进行早期开发,注意非智力因素培养。非智力因素指的是兴趣、动机、意志、品德、理想、社会适应能力等的培养。健优组的家长十分注意培养孩子对周围事物认知和学习的兴趣,经常用色彩鲜艳、会动、出声的玩具逗引孩子,讲有趣的故事,看吸引人的图书,共玩新奇的游戏。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主动性、灵活性、纪律性,尽量鼓励孩子与小朋友同玩,培养社会交往能力、与人同享、

有同情心、肯谦让、懂礼貌等品性,掌握科学的教育方式。两组家长采用的教育方式比较(见表 4)。从以上各方面可以看出健优组家长的素质较对照组家长略胜一筹。

表 2 父母看育儿书报的比较(%)(两组各 128 名)

阅读书报次数	健优组(%)	对照组(%)
每周≥3 次	43	24
每周 1—2 次	45	40
偶尔看或不看	12	36
$P<0.01$		

表 3 开始给孩子听音乐的时间(%)(两组各 128 名)

开始时间	健优组(%)	对照组(%)
孕期	21.5	10.9
0—6 个月	36.4	14.8
6—12 个月	16.4	21.1
>12 个月或无	25.8	53.1
合计	100.0	100.0

表 4 教育方式比较(%)(两组各 128 名)

教育方式	健优组(%)	对照组(%)	P 值
以身作则	66	44	<0.01
诱导、表扬为主	95	81	<0.01
物质鼓励	10	9	<0.05
限制过度	4	10	<0.01
迁就或溺爱	5	14	<0.05
父母不一致	3	18	<0.01

——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环境对儿童智能发育影响。对上海郊区乡镇 3~6 岁幼儿 220 名调查结果, 家庭环境调查问卷总分与儿童智商(PPVT 图片词汇法) 的关系, 二者成正相关, 相关系数 $\gamma = 0.4341$, $P < 0.01$ 。

从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儿童智商关系也可看出家长素质的影响(见表 5)尤以母亲的文化素养更为重要。

表 5 父母文化程度对儿童智商影响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 中	高中及以上	
人 数	44	135	41	
儿童平均智商 (PPVT 法)	89.48±14.66	99.35±14.72	100.33±15.05	
$P < 0.01$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 中	高中(中专)	大专以上
人 数	40	124	35	21
儿童平均智商 (PPVT 法)	91.18±11.48	98.87±16.16	96.49±13.44	104.05±15.73
$P < 0.01$				

——从儿童意外事故看父母素质。近 20~30 年来儿童意外死亡已逐渐上升为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我国 1991—1993 年全国分层抽样抽查 81 个市、县调查结果显示: 5 岁以下儿童及婴儿意外死亡农村为第 3 位死因 城市为第 4 位死因; 1~4 岁儿童不论城市农村均为第 1 位死因。我国平均婴儿意外死亡率为 502.1/10 万, 1~4 岁为 70.8/10 万, 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992 年日本、瑞士、英、法等 10 国婴儿意外死亡率为 6.2~38.3/10 万, 1~4 岁为 6.2~17.7/10 万。各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原因也有所不同, 英、美、法、日以交通意外为第一位, 而苏联、斯里兰卡等以溺水死亡为第 1 位, 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第 1 位死因为意外窒息, 97.9% 发生在婴儿, 以 3 个月以下小婴儿为多, 以寒冷季节盖被或与家长同

睡引起窒息致死,溺水则为 1—4 岁儿童第一位死因,主要发生于 1—2 岁幼儿,多发生于夏季水网地区农村,因无人照顾或照顾不周,不慎落入池塘、沟渠致死。故我国 5 岁以下儿童发生意外事故主要发生在家中及其周围场所,无人照看或家长安全意识不强是根本原因。这与父母家长的素质、掌握科学育儿知识和方法的程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要发动全社会共同努力,做好家长和孩子的安全教育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提高家长素质的一方面。

从上述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家长素质的高低是保证儿童少年安康成长的关键。父母素质一般包括其人生观、育儿观、文化素养、道德水平、性格脾气、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教育子女方式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等。虽然家长素质并不能完全代表家庭给子女所提供的一切环境因素,但父母的素质也确实主宰着家庭的各个方面,因此要优化家庭环境,必须首先着眼于提高父母家长的素质。提高家长的育儿素质可从以下对策做起:(1) 重视家庭教育,把家庭教育纳入国家教育和科研规划,落实到各有关政府行政部门,在各级教育机构如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学校等开办家长学校进行系统的家庭教育,提高各年龄段儿童的家长育儿知识和技能,此外在社区内建立家庭教育咨询站,便于家长遇到问题随时进行咨询。为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必须在相关学科建立科研项目,探究有关理论和实施方法;(2) 广泛进行科学育儿的科普宣传,通过各方媒体、电化教育、讲座、书刊等宣传如何正确地抚养教育子女,可开展各类家长评比活动,交流育儿经验心得,使科学知识及良好的经验得以推广,使家长的育儿水平进一步提高,以保证孩子安全健康成长。

家长教育观与儿童权利保护

[Abstract] In this modern society, family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How parent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and how parents comprehend the obligation of themselves as a protector will surely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of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in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ng in Family", this dissertation probes into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ducation conception and activities of Chinese parents, and analyses the negative affect on the pro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与配合。而家庭保护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政府都把家庭视为儿童权利保护的第一阵地,给予足够的重视。儿童家庭保护的直接责任承担者是家长,家长如何认识儿童的权利,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保护者的责任,将直接影响家庭保护的实施情况和质量。家长要全面了解儿童的权利,正确理解儿童权利保护的目、实质和内涵,端正

观念,规范行为,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本位”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人们从家庭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获得保护和恩泽,因而也把家庭看作自己的归宿和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谓“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就是家庭至上、家庭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状态。

“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状态对中国家长的教育观(包括儿童观、亲子观)和教育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积极的一面是“家本位”的文化心理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父母保护、教育子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护子女本来是一种自然法则,但在中国父母这里,它不仅来源于血缘亲情,而且包含着一种家庭(家族)利益的维护。在中国人看来,子女是家庭的延续。保护子女不仅是父母的天职,而且是家长的责任;不仅关系到子女的成长,而且关系到个人的成就大业和家族的名誉地位。亲情加责任再加利益,使得中国父母在子女保护和教育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可以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父母相媲美。这种文化传统对实施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内在动力。

然而,“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及其衍生物(如家庭本位的儿童观、父权至上的亲子观等)又在根本上与现代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对立的。现代儿童权利保护(包括家庭保护)的出发点首先是把儿童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与保护者享有同等的权利、具有同样的人格尊严的人来看待,只是由于其暂时的弱小和不成熟,才需要来自成人世界的保护。保护儿童是成年人的义务,而目的是帮助他们成长起来、强大起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享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为达到此目的,保护者在把儿童看作一个受保护者的同时,必须把他们作为一个权利主体、价值主体来对待,使其在保护过程中既得到又可体验到、并可促进其尊严和价值感的待遇。而家庭本位价值观下的儿童保护,

则是把儿童看作是家庭的附属品，其价值仅在于对家庭的贡献，因此，儿童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自然也就没有尊严可言。因此，家庭保护的目的是往往不在儿童自身，不在实现儿童自身的价值，而在实现儿童的“家庭价值”，即通过儿童的成就使家庭(家族)光荣、兴盛。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都变成了家庭的义务；而家庭保护儿童的义务，自然地变成了监督他们实现其对家庭的价值的权力。一旦儿童不理解这种义务或不能很好地尽这种义务，家庭保护就可能变成家庭伤害。消极作用在家庭儿童保护和教育作用中所造成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望子成龙心切,期望值过高

世界上所有的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子女抱有殷切的期望。中国家长的期望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光宗耀祖。在中国人的心里，子女的成才与否是和家庭的荣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子女成才,说明“家教有方”；子女不成器,是“缺少家教”。社会以成败论家长的功过，家长也把子女的成败看作自己的荣辱。这样，父母很自然就把自己所承受的社会和心理的压力，以高期望的方式转嫁给子女，造成孩子沉重的精神负担。

二、急功近利,强加于人

由于家庭的荣辱与子女的成功与否联系密切,而社会(包括家长自己)评价儿童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是学业成就“金榜题名”，所以父母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从小驱赶子女向父母精心为他们安排好的目标奔跑,而不顾其兴趣、意愿和能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为了自己理解的孩子的利益(其中包含着家庭利益)而侵犯其合法权益,是现在不少家庭悲剧产生

的原因。

三、终身服务,终身保护

家庭保护是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许多中国家长在父权至上思想的影响下,却把‘义务’理解为‘权力’;把对子女‘未成年’期内的有限保护变成无限期的保护,从不考虑权力的移交问题。他们只要求子女顺从,从不培养子女独立。家长似乎并不懂得,保护幼小者的目的是使他们顺利地强大起来,而不是继续幼小下去;今天的保护,是为了明天的不保护。有人比喻:西方的家长把子女看作搭在弓上的箭,随时准备射出;而中国的家长则视子女为系在手中的风筝,即要依附于家庭。因此,他们总是习惯于把子女置于自己的羽翼下,把他们的一切事务(甚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包揽起来。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的父母那样心甘情愿地为子女当牛做马,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子女像中国的子女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甚至盘剥父母的劳动、父母的终身保护、终身服务,存在着强烈的依赖心理。“老子捆住儿子,儿子缠住老子”,是中国亲子关系的生动写照;“长不大的儿子”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家教模式的恶果。父母的拳拳之心固然令人感动,但却不经意剥夺了子女最重要的权力——发展权。

另外,教育方式的简单,强迫命令多,耐心说服少,不允许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严惩,家庭生活不民主等等,也都是家庭价值取向的影响。

“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对家庭儿童权利保护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层次的。社会对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看到,我国现在也有不想对子女承担保护或不负责的父母,他们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是严重的,社会应该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的。在我国,家庭对儿童权利的侵害更多地来自于保护

儿童和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因爱而害”——出自爱、保护和教育的良好动机而侵犯儿童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儿童权利保护中的一大特点和问题。它最为普遍，而且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立法执法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在我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 胡金万

为父之道与儿童抚养

——中韩都市地区家庭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中韩两国都市父亲在儿童日常照顾中的作用。本研究应用了量与质结合的方法测量了两个国家中父亲的参与程度。研究采用了两份二手调查数据：当代中国女性地位调查（1991）与韩国家庭功能与角色变迁全国性调查（1989）。在这两份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对两个国家单独进行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两国不同的父母参与模式及其影响因素，2002年我们在中国和韩国（上海与汉城）分别进行了焦点组访谈。

正如我们的预期，在照顾儿童方面，中国父亲比韩国父亲的日常参与度高。有四个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高参与度：1) 中国女性就业率比韩国高；2) 中国日工作时间比韩国短；3) 中国性别角色方面传统价值的作用比韩国小；4)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四个因素源于各国不同的社会政策。

本研究认为，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增加父亲在儿童照料方面的参与度，政府应当发展、完善并鼓励更加有利于家庭的政策。

1. Introduction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father's involvement with children in terms of daily care in both China and Korea. As

large numbers of women have entered the labor force, childcare has become a universal concern in every society. Many societies have implemented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and social support for childcare but few meet the demand.

For societies in which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is not well established, childcare has become a family responsibility. 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pursued and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ve strongly encouraged women's employment but ignored childcare issues. Therefore, familie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juggled childcare issues, and wome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particularly from a double burden. Governments' heavy emphasis on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for childcare combined with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have entailed a great demand for fathers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and to share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Most studies on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childcare have focused on Wester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but rarely.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ther's involvement with childre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topic in China and Korea.

China and Korea have important similarities in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historically have shared Confuc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xperience of rapid change in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Korea has taken off much earlier and been more prosperous and advanced economically tha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in that

they have taken different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China became a socialist country pursuing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Korea became a capitalist country purs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the national objectives were different for each country, and subsequent social policies regarding women's employment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diverged. The degree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allows us to see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ies on gender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family in each country.

2. Data and Methods

For the comparison of the paternal engagement with children in each country, this study first uses second-hand survey data from each country: *Women's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1) and the *National Survey on Changes in Functions and Roles of Korean Families* (1989). The Chinese survey used probability sampling of intact husband-wife families in six province-level units (Shanghai, Shandong, Jilin, Ningxia, Shanxi, and Guangdong) to produce 4,509 couples. The Korean survey use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of married women in all provinces except Cheju and other small islands.

Drawing on the two surveys, it explores paternal involvement rates with children in terms of daily care.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people's perceptions regarding parental roles and childcare, this study also conduct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 each country (Seoul and Shanghai) in 2002.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Characteristics	China	S. Korea
Year	2002	2002
Sample size	—56 interviewees (Shanghai)	—50 interviewees (Seoul)
Number of groups	—9 groups (Shanghai)	—8 groups (Seoul)
Age range	26 – 50	28 – 52
Marital status	Ever-married	Ever-married
Sex	Both men and women	Both men and women

3. Hypothesis and Findings

Despite diverse arguments on women's statu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socialist countries, previous studies that compared socialist and capitalist countries often have demonstrated that women in socialist countries enjoy better status in the family and in the workplace than those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Compared to capitalist societies that valu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ist societies, including China, long employed the rhetoric of emancipation of women and pursued social development (Tang and Parish, 2000). In order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attempted to abolish Confucian values, which in turn has weakened traditional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oles. In contrast, in Korea, women are still discouraged to work after the childbirth, and Confucian values have been maintained, although in a weakened form. Therefore, I hypothesized that men in socialist countries, meaning men in China in this study, shar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care than men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specifically, in this study, men in Korea, recognizing